

媒介融合语境下——

文学凝聚优势再出发

刘大先



用一生体会戏曲之美

郭汉城

我为什么会一辈子从事戏曲工作？有个人原因，也有时代原因。从小就爱看戏。绍兴大班乱弹戏、越剧前身“的笃班”“小歌班”、婺剧，都是我在老乡们影响下喜欢的。抗日战争爆发，我离开故乡萧山，从湖南转到陕北公学构邑分校，集中精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1949年，我较多地接触到戏曲改革工作，1952年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召开，两个月的演出中，我集中观摩了很多剧种的优秀作品，后来又得到很多地方看戏。这些经历更加坚定了我的信念：中国有这么多戏曲，这么好的戏曲文化，我要一辈子从事戏曲工作。

后来重新选择工作时，我毫不犹豫地选择到中国戏曲研究院，从事戏曲理论研究工作。中国戏曲研究院于1951年4月3日刚成立，就承担起新中国的戏曲改革工作。通过演员讲习班、剧本讨论会、剧团调查等，推进戏曲“改人、改戏、改制”。我在观看戏曲、了解剧团、接触演员的过程中，慢慢地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相互联系。

张庚同志是我们的老师，也是我们的领导。他一开始就明确理论研究要为戏曲改革服务。尤其在戏曲改革初期，大家的认识不太统一。这么改戏行不行？怎么改才对？戏曲理论研究要帮助大家厘清这些疑问。通过实践，我们逐渐意识到，研究工作不仅是看几部戏、开几个会。要进一步发挥理论对实际的推动作用，就必须有“戏曲史”“戏曲论”，就写一部戏曲史，让人们理解戏曲历史和当前的关系；写出一部戏曲理论，从规律上总结戏曲创作、戏曲表演问题。比如研究戏曲的“三性”，综合性、写意性、程式性，就是引导人们把握戏曲艺术本质。此外，还有一个任务就是培养人才，在史论研究、戏曲创作中，培养有专门知识和系统知识的后续人才。

按照这个思路，我们一起完成了《中国戏曲通史》和《中国戏曲通论》。目的是保护、发扬我们的戏曲文化，把过去的经验好好地总结起来、把好的戏曲政策继续推进下去。如果总结我们的研究经验，那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来指导戏曲改革；理论与实际相联系，用理论推动实践，在实践中检验理论、发展理论。后来我主持出版《前海戏曲研究丛刊》，也是力求推进戏曲理论体系建设。

几十年来，我国的戏曲创作一直贯彻“三并举”政策，即传统改编戏、新编历史戏和现代戏并举。我认为现代戏最有发展空间，取得的成绩最大。现代戏创作，最重要的是处理好与民族形式、与艺术传统的矛盾。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已经拥有一套适合现代题材的表现手法和艺术形式。要辩证看待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这样戏曲的“三性”就能够现代戏中得到实现和突破。

中国戏曲，老百姓即使一个字都不识也能看懂。为什么？因为戏曲有高度的人民性，有高度的民族性和独特性。坚信人民性，与我在抗战中的经历有关。1939年我从延安来到河北平山，从事抗战教育工作。在穿行山西时，经历了饥饿、劳累、疾病甚至死亡的威胁。正是依靠当地村民的帮助，部队从一个山头转移到另一个山头，最终突破重围、走出了无人区。没有人民的组织、没有人民的力量，是没办法成功的。重视人民、相信人民能够战胜一切困难、绝对不能脱离人民，这都来自我的实际生活经验。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个自信”，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使我对戏曲工作的理解和认识彻底贯通了。中国戏曲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它不只是艺术问题，还关系国家文化前途、关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我今年104岁，正式从事戏曲工作已经60多年。感谢新时代，让我对戏曲的未来、对民族文化的未来充满信心。

郭汉城，生于1917年，戏曲理论家、诗人、剧作家、新中国戏剧戏曲学学科创建者之一、中国艺术研究院终身研究员，曾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戏曲研究所所长、《戏曲研究》主编等职。曾获首届“中华文艺奖·终身成就奖”，著述收录于《郭汉城文集》。



展望文学未来，归根结底要为人民而写

作为一种文化创造，文学的价值不仅在于深描一段历史或现实，其本身也是历史进程中的能动行为。这种能动行为包含两个维度，既有对已知事物的体认与对宏阔历史的洞察，也有超越个体经验，对更广阔范围内他人的关怀与理解。文学应成为时代的先觉者、先行者与先倡者，能够达致观念、情感与价值上的认同。这是文学对现实产生反作用力的具体方式。

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学经历多次探索：从“写什么”（题材与内容）到“怎么写”（形式与技巧），从“为谁写”（功能与受众）到“在哪发”（平台与传播）。当前我国综合国力迅速跃升，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确立中国文学的地位和价值，树立具有世界影响的中国话语和中国价值，依然在路上。随着教育的普及和全球信息的便捷获取，人民的审美趣味不断提升，这就需要一种弥合高雅与通俗分野，继承并突破既有文类、风格与技法，面向未来的文学。在全球化时代，展望与勾勒文学的未来，最终要落脚于人民。

人民既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文学观与价值观的形成是一个系统工程，扎根人民是基础与途径，从人民生活中汲取营养是方法，通过精深、精湛、精良的作品反馈给人民则是目标。文学历史与现实经验启示我们，只有那些熔铸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于一体的作品才能具有恒久而普遍的价值。思想性承载精神的深度与情感的厚度，艺术性体现形式的高度和技巧的力度，观赏性指向实现最大范围受众的广度。对于当代文学创作而言，必须全面考虑这三方面，既不能高蹈地谋求脱离现实的普遍性，也不能沉溺于细枝末节。当代文学要立足于具体的时代与社会，在批判继承中外古今文学经典的基础上，做出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萃取我们时代的故事、形象、话语与价值，传达友爱、团结、共同追求美好生活的观念，展现中国文学对世界文学的贡献。唯有如此，文学才能做到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制图：蔡华伟



核心阅读

口头文学再次复兴，书面文学持续发展，网络文学方兴未艾，它们并没有非此即彼地取代对方，而是在融媒体中共存共生

文学以想象和叙述综合性地介入对于历史与现实、个体与总体的认识与书写之中，为各艺术门类提供思想与美学资源，进而潜移默化、润物无声地进行精神引领，推动文化建构

确立中国文学的地位和价值，树立具有世界影响的中国话语和中国价值，依然在路上。文学观与价值观的形成是一个系统工程

中，从而发挥其在文学生产与评价过程中的能动性。

当代文学正在遭遇来自新媒体文艺、人工智能写作、文学接受方式革新等多方面的挑战。但技术与工具理性并不能取代人文、经验、情感与价值理性，并且科技与人文可以相互融合与转化。伴随媒介与科技革新，现代以来的“文学”疆域不断拓展，从“纯文学”向“杂文学”“泛文学”“大文学”发展。与此同时，体裁的“四分法”（小说、诗歌、戏剧、散文）被越来越多的跨界文类突破，审美观念与风格也不再是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等理论所能涵盖。这都相应地引发对于当下文学功能与价值的思考。

文学功能随历史发展演变，始终在文化创造中发挥基础性作用

文学的功能在最初起源时是复合性的，可以归纳为以下四种：一是自我表达，“诗言志”，通过描写、叙述、抒情、议论等体现创作

者的心意、志向与观念；二是审美与娱乐，通过优美的语言与形式让人得到情绪宣泄、情感抒发、精神提升的喜悦；三是认知与启发，“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通过特定方式启迪、增进读者对自然、社会与自我的理解和认知；四是教育与提升，一方面团结凝聚、净化陶冶、宣传激发，一方面观察思考时代，推动社会发展进步。

伴随历史发展，这些综合性功能相应发生侧重点的转移。新中国成立后，现代文学“为人生”与“为艺术”的诉求最终融入“二为”方针。进入20世纪下半叶，读者的阅读需求愈益受到重视，形式探索和自由表达得到张扬。随着文学的专业化，其认知和教育功能很大程度上被哲学、历史等人文社会科学以及自然科学代替。文学在内部也产生细分：严肃文学侧重审美，通俗文学侧重娱乐。

面对这种情形，如何定位文学的当代价值尤为重要。我们必须回到最基本的问题，即文学怎么从个体出发而通达更广泛的人群？严肃文学创作者如何介入当代文化生产，而不是囿于小圈子的趣味或孤芳自赏的喜好？如何在读者的娱乐消遣中实现普及与提高的辩证统一？

文学既是具有创造性的文化产品，也能成为具有流通价值的文化商品；既要彰显社会效益，又要体现市场价值。其特殊性在于，作为经验、情感和观念的表达，文学具有强大精神力量与持久思想价值，因而具有文化传承的功能。也就是说，经典文学是超越一时一地的。人类古往今来的典范性作品，无不跨越时间、地域、语言和族群界限，成为普遍性的人类无形文化遗产。先秦诸子散文、《摩诃婆罗多》、《史记》、杜甫、但丁、莎士比亚、歌德、曹雪芹、托尔斯泰、鲁迅……如同距离不同光年的星辰同时映现在天宇之上，不同时代和国家的经典作品和作家都融合在当代文化之中，成为共享的集体记忆与文学滋养。

尽管随着专业分工日趋细化，文学生态发生很大变化，但因具有整体性想象的能力，所以可以整合各类信息，赋予碎片化、瞬间化的信息流以“有意义的形式”，成为文化创造的母体，在众多文艺创造活动中发挥基础性作用。较之美术、影视、戏剧等，文学较少受到材料工具、资金场地、人员配置和技术设备的影响，凭借个人和简单装备就能完成。文学以想象和叙述综合性地介入对历史与现实、个体与总体的认识与书写之中，为各专业艺术门类提供思想与美学资源，进而潜移默化、润物无声地进行精神引领，推动文化建构。柳青《创业史》、路遥《平凡的世界》都在极为简陋的环境中完成。其素朴的语言、浓郁的情感、贴近人民的观念与形式、对时代变革具体生动的描写，使其在几十年后依然是广播影视改编的重要资源，发挥着持续性的影响力。

既要特色，也要共识

罗小茗

外，当前文艺类型和文化产品极大丰富，文化市场不断细分，无论个人爱好多么小众，通过网络和社交媒体，都能找到同好。特定文化圈层一经形成，创造和沟通的模式随之诞生；同好之人可以一起探讨，共同深耕这一领域。比如某视频弹幕网站涵盖7000多个兴趣圈层，许多内容逐渐从小众走向大众。比如，以民族舞蹈、民乐、汉服等为代表的“国风”内容增长迅速。当前“国风”爱好者已经超过4000万，创作者大多是95后，是热衷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年轻群体。年轻人对“独特性”的追求也加固了圈层，各种应用通过精准推送进一步强化这一趋势。这个过程容易造成“信息茧房”效应，

即圈层内部与文化整体相隔膜，缺乏对社会整体的理解和认知。有鉴于此，一方面，我们要清楚认知大众文化“圈层化”的形成过程，认识到是技术的迭代和青年文化寻求个性标识的诉求彼此呼应，形成了今天的圈层化。另一方面，则要从大众文化圈层化现象中，获取推动社会文化生产的有益启示。对自身处文化圈层中的个体来说，可推动圈层文化中的部分文化要素为时代和社会共享，积极促进圈层文化与文化整体的互通，实现圈层文化的“破壁”“出圈”。

数字化时代，人们看似可以掌握无穷信息和海量知识，但要达到这一点，首先要走

出自己的舒适圈、小天地，这是互联网时代带给每个人的挑战，也是我们必须培养的媒介素养。大众文化的圈层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现象，我们要正视它、研究它、善用它，激发其内在文化创造力，使其成为推动社会文化蓬勃发展的力量。



作为数字化时代的文化热词，“圈层”指人们信息的接受、文娱产品的选择以及社交，在某一相对固定的群体范围内进行。大众文化圈层化，是互联网技术和大数据应用的副产品。根据人生经历、教育背景、兴趣爱好等多方面的大数据，互联网使用者被划分为若干个群组。不同种类的信息和文娱产品，依此“精准”推送。在此过程中，个体构建起具有独特自我标识的信息世界，对信息和知识的获取，也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从我认识或认可的人那里获取”。

“圈层”的出现有其必然性。面对海量内容，人们需要高效率地筛选出有效信息，因此形成对特定信息源的偏好和依赖。另